

有关评价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几个问题

——与王亚南同志商榷

李 守 庸

近年以来，在如何评价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问题上，存在着一些值得商榷的看法。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指示我们：“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还指出：“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一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①我们认为，这是对于人类认识和认识史，包括各种思想史、学说史的精辟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这种分析，在我们研究和评价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时，无疑也是完全适用，而且应当作为指导思想的。然而在近年来有关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研究中，有一些见解在我们看来却是与这一指导思想相背离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成就，曾经给予应有的评价。这是由于古典经济学者特别是其中的亚当·斯密和里嘉图，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内部结构，作过一定的探索，并从而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始基。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列宁才把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看做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但是能否因此就忽视甚至完全撇开古典政治经济学及其代表者的资产阶级、剥削阶级的本质，而只片面强调其历史进步作用和科学成就的一面呢？我们认为不能这样。在研究与评价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时，既要对其一定的历史进步作用和科学成就作阶级的、历史的分析，作恰如其分的估价，又必须同时揭露和批判其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一面，揭露和批判其剥削阶级的实质。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贯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历史观点，才能正确评价古典经济学的科学成就与历史作用，才能辨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本质区别，也才能划清剥削与被剥削的阶级界限。

根据以上观点来考察，在近年来有关评价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著作中，我们认为王亚南同志在1962年前后连续发表的几篇文章，其中有几个问题是值得商榷的，这包括：如何估价古典经济学的成就的问题，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与古典经济学的关系的问题，以及如何理解今天研究古典经济学的意义的问题。

(一)

在如何估价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成就的问题上，我们认为王亚南同志文章中有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是值得商榷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72页。

第一是如何估价古典经济学派对待阶级利益与科学真理之间的关系的问题。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史》这部著作中，曾指出里嘉图之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琼斯对于诸生产方法的历史区别，开始有了认识；指出琼斯把资本和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只看做是社会生产发展上的一个过渡阶段。王亚南同志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及其发展》^①一文中，根据琼斯经济学说的这一个方面，作出了这样一个判断：“当然，作为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者，提出这样的问题，已经表示他在科学真理与阶级利益不一致的时候，服从科学的要求，比服从阶级的要求还要勇敢一些”；作者并进一步认为“这也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大特点，虽然它也只限于阶级斗争还未发展到白热化的历史阶段。”^②这样，“在科学真理与阶级利益不一致的时候，服从科学的要求，比服从阶级的要求还要勇敢一些”，就不但被看做是琼斯的特点，而且还被认为是整个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一大特点了。我们认为这个看法是值得商榷的。

对于古典经济学的一定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如实地加以肯定的。但我们应首先弄清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根据怎样的前提来肯定古典经济学的一定的科学性的呢？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肯定古典经济学一定的科学性，是从以下这一前提出发：即认为在古典经济学产生与发展时期，由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尚未显露，因而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古典学派还不感到无产阶级的威胁，还不感到本阶级有复灭的危险，还有可能使他们幻想资本主义制度是永恒的社会制度，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允许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一定的科学的探索。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的跋中讲得很清楚：“政治经济学，在它还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不把资本主义秩序视为是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把它视为是社会生产的绝对的和最后的形式的时候，本来只有在阶级斗争仍然潜伏进行，或不过在个别孤立现象上表露的时候，能够还是科学。”^③可见，古典经济学者其所以能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作一定的科学的探索，其根本原因在于还未受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威胁，而不在于“服从科学的要求”的“勇敢”。

在如何估价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对待阶级利益与科学真理的关系这个问题上，我们认为有必要认真学习和领会毛泽东同志以下的指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④毛泽东同志在这里论述的是阶级性与艺术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包括以往的一切阶级如何对待阶级性与艺术性之间关系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个论断具有普遍意义，同样适用于考察以往的一切阶级如何对待阶级性与科学性之间关系的问题。根据这个论

① 载《新建设》，1962年第10期。

② 同上，第24页。

③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2版，第XVI页。

④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67、871页。

断,应当认为,以往的一切阶级,包括“阶级斗争还未发展到白热化的历史阶段”的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古典经济学派,都只可能把阶级的要求放在第一位,都不可能有超阶级的科学要求,都不可能“在科学真理与阶级利益不一致的时候,服从科学的要求,比服从阶级的要求还要勇敢一些”。否则,那还怎样能够理解古典经济学从本质上代表剥削阶级——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一历史事实呢?我们再来看看实际情况。就以古典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亚当·斯密来说,我们看到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中,一方面指出他企图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内部结构,同时又指出斯密对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是“依照这种关联在竞争的现象中,在一个不科学的观察者眼里,并且在一个对资产阶级生产过程实际抱有私利的人眼里表现出来的模样,加以叙述。”^①可见,如果断论“服从科学的要求比服从阶级的要求还要勇敢一些”是整个古典经济学的一大特点,那与经典作家原著的精神,也是难以相符的。

如果不是就整个古典经济学,而是就古典学派的个别代表人物来说,我们认为马克思对于里嘉图的某些评价倒是值得深思的。我们知道,马克思曾在不同的处所,指出过里嘉图的“科学的诚恳性”。马克思还说过这样的话:“如果里嘉图的见解大体上合于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那只是因为(并以此为限)他们的利益,和生产的或人类劳动生产性的发展的利益相一致。只要二者成为对立的,他就会毫不姑息的反对资产阶级,象他现在反对无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一样了。”^②马克思的这段话应当怎样理解?能否从马克思的这段话里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经典作家认为里嘉图当科学真理与阶级利益不一致的时候,服从科学的要求比服从阶级的要求更勇敢一些?为了把这个问题弄清楚,我们准备再征引一些经典著作的原文。

恩格斯在论述18世纪的重农学派,和古典学派的亚当·斯密时,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关于启蒙学者所说的话,也可以用于那时的经济学家,在他们看来,新的科学不是他们时代的关系和需要的表现,而是永恒的理性的表现,经济科学所发现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不是由历史规定的那种经济活动形式的规律,而是自然的永恒规律:这些规律是从人的本性中引伸出来的。可是,仔细予以研究,就可以看到,这里所说的人,只不过是当时正处在转变为资产者的过程中的那些中等市民罢了,而他的本性,也不过是在于根据当时的由历史规定的关系,来从事生产和贸易罢了。”^③至于关于18世纪的启蒙学者,恩格斯是这样说的:他们“求助于理性,把理性当作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裁判者。他们要求建立合乎理性的国家、合乎理性的社会,要求无情地铲除一切与永恒理性相矛盾的东西”。这个“永恒理性”究竟是什么呢?恩格斯接着指出:“我们也已经看到,这个永恒理性实际上只是正在那时发展成为资产者的那些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悟性”。“合乎理性的社会制度”实际上使“富有和贫穷间的对立……更加尖锐化起来了”;“财产自由”实际上成为了小资产者和农民“在大资本和大地产强大竞争压迫下出卖他们小财产给这些大财主的自由”,成为他们“失去财产的自由”^④。

① 《剩余价值学说史》第2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5页。着重点为引者所加。

② 《剩余价值学说史》第2卷,第297页。

③ 《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55页。

④ 参见《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5年版,第120页。

里嘉图和重农学派、亚当·斯密,以及和18世纪的启蒙学者,都属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恩格斯对后者的论断,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对里嘉图的评价。根据恩格斯对重农学派、亚当·斯密和启蒙学者的论断,我们认为前引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一书中对于里嘉图的评价,应当这样来理解:

第一,里嘉图自以为代表着生产的或人类劳动生产性的发展的利益。而这种生产的或人类劳动生产性的发展的利益,实质上也就是当时工业资产阶级要求发展生产的利益,简言之即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因而尽管里嘉图在主观上自以为只是代表着生产的或人类劳动生产性的发展的利益,但实质上、在客观上,里嘉图仍然只是代表着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

第二,由于里嘉图自以为只是代表着生产的或人类劳动生产性的发展的利益,因此马克思指出,如果一旦里嘉图发现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与他所代表的这种利益相对立,他会毫不姑息的反对资产阶级。但由于里嘉图所代表的生产的或人类劳动生产性的发展的利益,实质上即是当时的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归根到底他仍然是在维护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不是如他自以为的那样是在反对。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中为了说明前引那段话的意思而列举的里嘉图的一段话,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里嘉图在《论农业的保护》一书中认为,在谷物自由输入之际,“不可否认的会有一些资本损失掉。但……我们所要的是财货的剩余。所以,如果证明了,牺牲我们的资本一部分就可以扩大有益于我们的享乐和幸福的财货的年生产,我们看到我们的资本一部分遭损失,就不应喃喃不平了。”^①马克思接着解释里嘉图的这段话:“里嘉图把那种不属于我们或他,但已经由资本家们固定在土地内的资本,叫做‘我们的资本’。但我们(1)是指国民的平均。‘我们的’财富的增加,就是社会财富的增加,这种增加本身就是目的,和这种财富由谁分享的问题是毫无关系的。”^②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在这里对于里嘉图的论述,和恩格斯对于重农学派、亚当·斯密以及对于启蒙学派的论述,在基本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只不过在这里马克思没有象恩格斯对重农学派等那样,对于里嘉图这种以社会财富的增加为目的的思想本质作进一步的分析而已。而马克思其所以在这里没有作进一步的分析,我们认为那是由于马克思在这里提出的任务是批判资产阶级的公开的、庸俗的辩护士马尔萨斯,因而强调了里嘉图的“科学的诚恳性”的一面,以与马尔萨斯相对比。因此在这里我们完全有理由以恩格斯的分析为根据,而看到里嘉图所说的“有益于我们的享乐和幸福的财货的年生产”的“扩大”,实质上即指有益于资产阶级的享乐和幸福的财货的年生产的扩大。他在这里所论证的,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如何牺牲部分而有益于全体,牺牲当前而有益于将来的问题。因而实质上仍然是代表着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在说话。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即令从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中对于里嘉图所作的评价来看,也不可能得出里嘉图在科学真理与阶级利益不一致的时候,服从科学的要求比服从阶级的要求更勇敢些这样的结论来。

至于琼斯本人,能否因为他一定程度上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性、过渡性,就认为他在科学真理与阶级利益不一致的时候,服从科学的要求比服从阶级的要求更勇敢些呢?

① 转引自《剩余价值学说史》第2卷,第297页。

② 《剩余价值学说史》第2卷,第298页。

我们认为也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看到,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中,在肯定琼斯这种发现的进步意义的同时,曾反复强调琼斯“当作经济学者,他还是这样被拘囚在资产阶级的拜物教内”,“琼斯的理解,还拘囚在经济学的偏见中”^①。可见从经典作家的原意看,是不能得出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琼斯在经济学说上跳出了本阶级利益要求之外这样的判断来的。然则对于琼斯能够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性、过渡性这一现象,究应作何解释呢?我们认为这应当联系到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来理解。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过渡性的看法,是在《国民经济学教科书》这一著作中提出的,该书出版于1852年。在这个时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已逐渐趋于公开与尖锐。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马克思在《资本论》初版的序中曾指出:“甚至在统治阶级中间,也透露出了一种模糊的感觉,感觉到现在的社会不是什么固定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不断在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②马克思还说:“英王的驻外代表,就用直率的文句,力说劳资现有关系的变革,……美国副总统威德先生,也在公众大会中宣称,奴隶制度废除之后,资本和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革会跟着出现到日程中来!这是时代的标志,不是紫袍黑衫遮盖得住的。”^③当然不能想象,这些英王的驻外代表,或美国的副总统先生,会在服从科学的要求上比在服从阶级的要求上更勇敢一些。可见资产阶级的理论代表琼斯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性、过渡性,自有其社会历史条件作根据,而不是什么“服从科学的要求,比服从阶级的要求还要勇敢一些”的结果。

关于如何评价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成就,我们认为王亚南同志文章中值得商榷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估价古典经济学中的唯物主义成分的问题。

据王亚南同志在上引同一篇文章中说:“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初的创始者,到最后的完成者,其中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唯物史观的继承接力过程。”^④我们认为这个观点同样也是值得商榷的。

我们知道,资产阶级在其发展初期,为了向封建阶级进行斗争,同时也由于本身还没有受到无产阶级的威胁,曾经运用唯物主义作为自己斗争的工具,并曾确信周围的事物是物质的产物。因此,处在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的古典经济学,也曾经力图探索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内部结构。从这个意义说,我们可以而且应当认为古典经济学具有一定的唯物主义成分。但能否依此而断论古典经济学从其创始者到最后完成者,其发展过程是一个“唯物史观的继承接力过程”呢?我们认为不能这样看。

这里有必要首先弄清楚唯物史观究竟是由谁所发现,和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唯物史观就是历史唯物论或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向认为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所首创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序言中,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精确而扼要的表述时,将这一基本原理毫不含糊地称之为“我得到的、并且随后即成为我的研究工作之导线的一般结论”^⑤,并且指出恩格斯从别一条路得出了同

① 《剩余价值学说史》第3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83、484页。

② 《资本论》第1卷,第XIII页。

③ 同上书,第XII—XIII页。

④ 《新建设》,1962年第10期,第25页。

⑤ 《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II页。

马克思他自己一样的结果^①。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演说》及《反杜林论》等著作中，一再强调唯物史观的发现应当归功于马克思。列宁也指出“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更确切地说，彻底发挥唯物主义，把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现象”上去的，是马克思^②。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更进一步向我们指明“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个伟大的理论”是“无产阶级运动的伟大的活动家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造的^③。

至于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已作了完备的表述；毛泽东同志对这个原理更作了进一步的概括，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④

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上论断为尺度，来衡量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发生、发展过程，首先，我们不能把唯物史观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发现归之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派；其次，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来衡量，我们将看到古典经济学从其创始者到完成者，这中间有唯物主义成分的相互继承的一面，但从根本上说则只是唯心史观而不是什么唯物史观的“继承接力过程”。我们先看看马克思曾称之为“近代经济学的真正的始祖”的重农学派。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中指出，重农学派将生产的资本主义形态当作社会的生理形态去考察，是“一种伟大的功绩”，并且指出“这是物质的法则”。但马克思同时指出，他们的缺点则在于“把资本主义的生产形态，看成生产之永久的自然形态”；在于“把一个确定的历史的社会阶段之物质的法则，当作抽象的同样支配一切社会形态的法则来考察”。^⑤再以古典经济学的最后完成者里嘉图来说，马克思曾一再肯定过他的“研究方法的科学意义和伟大历史价值”，但同时，马克思也反复指出他是把资本主义社会看做永恒的、不变的社会制度。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中指出，里嘉图甚至把“原只是资本主义生产之最后的结果”，看做是“‘社会初期’的一个现象”^⑥。换句话说，里嘉图是把资本主义以前一切的社会都看做资本主义社会的。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在形而上学家看来，资本主义的剥削，……就是在古代的奴隶社会里，甚至在原始社会里，都可以找得出来，而且会要永远不变地存在下去。”^⑦可见，古典经济学的创始者也好，完成者也好，他们的学说从根本上说，恰恰是不折不扣的形而上学观点，而不是什么唯物史观。而形而上学的历史观点归根到底也就是唯心史观。

确实，古典经济学的最后完成者里嘉图，曾经“有意识地把阶级利害关系的对立，工资与利润的对立，利润与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⑧。从这一点看，可以而且应

① 参见《政治经济学批判》，第III页。

② 参见《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8页。

③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1、292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91页。

⑤ 以上均参见《剩余价值学说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6、37页。

⑥ 《剩余价值学说史》第2卷，第541页。

⑦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9页。

⑧ 《资本论》第1卷，第XVI页。

当说在他的学说中包含有一定的唯物主义因素，但与唯物史观却还相差很远。在这里我们不妨作一个类比。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指出在法国历史家和部分英国历史家的新学派中，曾经产生过一种信念，“认为欧洲历史的推动力——至少从中世纪起——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争取社会和政治统治权而进行的斗争”^①。这个观点，应当认为较诸里嘉图的阶级对立的观点，具有更多的——至少是相等的唯物主义因素；然而恩格斯恰恰是把这种观点和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史观作了对比之后，而断定只有马克思才“破天荒第一次”把历史“奠定在它的真正基础之上”^②。

(二)

在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关系问题上，特别联系到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的问题，我们认为王亚南同志的有些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在这个问题上，王亚南同志所反复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为来源，或者说，前者是在后者的基础上发展过来的”^③；“批判的展开，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建立”^④；“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就是沿着他们（指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引者注）这种科学的考察，而加以批判发展的结果”^⑤。在有关的几篇文章中，王亚南同志几乎一句也没有提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与当时的阶级斗争的实践和马克思、恩格斯亲身参加这种实践，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对当时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考察、分析、研究的关系。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带有很大的片面性的。

我们同意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是离不开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的继承的。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而且我们认为是更加重要的一个方面，应当看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是马克思、恩格斯亲身参加当时的阶级斗争，领导当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以及根据巨量的历史和现实材料，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进行周密深入的考察、研究的结果。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指出：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是“到了他们实践的第二个时期——有意识有组织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时期，由于实践，由于长期斗争的经验，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用科学的方法把这种种经验总结起来”，才“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⑥；又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⑦。我们认为毛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第161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第162页。

③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载《经济研究》，1962年第11期，第42页。

④ 《新建设》，1962年第10期，第25页。

⑤ 《研究古典经济学的现实意义》。载《人民日报》，1962年1月13日，第5版。

⑥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7页。

⑦ 同上书，第276页。

泽东同志的这些指示，既是对理论产生于实践这一原理的阐明，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的历史过程的真实的反映。因此，如果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仅仅归之于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批判继承，一方面既不符合于理论来源于实践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同时也不符合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的历史过程的实际。

有的同志还提出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问题上，其所以强调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批判继承关系，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批判继承本身，既是一种科学实验的实践，同时又是阶级斗争在经济思想领域里的反映，因而也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我们认为，理论斗争虽然也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但我们不能以此为根据，而忽视马克思、恩格斯参加与领导当时政治领域里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进行考察、研究这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的根本原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认为，人类对于外界的认识，其来源有源与流之分。关于这个问题，恩格斯在《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一书中，是从内容与形式的角度来考察这种区分的。他指出：“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一方面对统治于现代社会中的阶级对立即有产者和无产者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间的阶级对立进行观察，另一方面对笼罩于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进行观察所得的结果。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不过表现为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们所提诸原则的进一步的和好象较为彻底些的发挥。”^①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虽然“必须首先根据在它以前已经积累起来的思想资料出发”，但“它的根源是深藏在物质经济事实中”^②。毛泽东同志关于这个问题的指示更加明确，他在论述文学艺术的来源时，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的源泉，而“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③。我们认为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指的虽只是文学艺术，但这一论断的基本精神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类认识来源的源与流之区分这一原理，应当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参加了当时政治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实践，和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了科学的考察、研究，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的根本的原因，这是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也离不开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批判的继承，但这不是源，只是流。我们认为，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中，关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来源的这个论断，正应当根据恩格斯、毛泽东同志关于人类认识的来源有源与流之分这个原理来理解。因为在这篇著作里，列宁只是论述马克思主义与其先行思想资料的关系，而不是全面论述马克思主义如何产生。而列宁当时着重指出马克思主义与其先行思想资料的批判继承的关系，则是从反对当时的资产阶级学派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诽谤，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宗派”这一斗争任务出发的，是完全正确的。在今天，当我们论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之间的关系时，如果不着重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之“源”的一面而只强调其“流”的一面，则是很不恰当的，是与我们今天的斗争任务不相适应的。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这一著作中指出，我们尊重历史，“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讚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第117页。

③ 参见《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2页。

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①我们认为，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指示虽然是在四十年代初期针对中国文化情况而发，但对于指导我们如何理解与论述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在今天仍具有极为宝贵的启示意义。

在论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时，如果片面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为来源”，而不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创立这个学说与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之间的关系，不但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而且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从阶级性上说，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是根本对立的学说。如果只片面强调前者“来源”于后者，就会模糊两者之间的阶级界限和根本区别，低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伟大变革及其作为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武器的伟大意义。在我们看来，正是基于这种原因，王亚南同志有时甚至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批判的继承，与古典经济学本身在其发展过程中的先后继承关系，看成很少以至完全没有区别。比如王亚南同志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及其发展》一文中，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无非是由于这些经济学者分别结合时代提到他们面前的问题，就以前有关的学说，加以批判继承的结果”^②。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呢？在王亚南同志看来也不过是“沿着他们（指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引者注）这种科学的考察，而加以批判发展的结果”^③。试问，照这样说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过程，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本身的发展过程，这中间还有什么区别呢？

（三）

在有关研究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目的与意义这个问题上，我们认为王亚南同志的有些见解也是不妥当的。在《研究古典经济学的现实意义》^④一文中，王亚南同志提出研究古典经济学有三个方面的现实意义，即“加深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加强对于庸俗经济学的斗争”和“批判地吸收人类文化的遗产”。我们认为在所有这三个方面的意义的阐述中，都有一些问题值得商榷。

王亚南同志在这篇文章中说：“古典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来源。学习研究古典经济学会加深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可见，王亚南同志认为研究古典经济学可以加深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解，是仅仅从“古典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来源”这一前提出发的。我们认为即令撇开源与流的区别不论，王亚南同志在这里所规定的前提也是片面的。因为这个前提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象我们在上面指出过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阶级属性上看，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有着本质的区别。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根本任务，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永恒性这一前提下论证如何增加资本主义社会财富，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任务，正好与此相对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701页。

② 《新建设》，1962年第10期，第25页。

③、④ 《研究古典经济学的现实意义》。《人民日报》，1962年1月13日，第5版。

立，在于揭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剥削压迫实质，论证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必然灭亡。因此，我们在论证研究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对于加深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意义时，还必须同时从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着眼。只有这样，才可能更深刻地领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伟大意义，真正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彻底代表无产阶级阶级利益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

这篇文章在阐述“研究古典经济学，加强对于庸俗经济学的斗争”这一意义时认为：

“我们对当前的庸俗经济学展开斗争，仍然不妨把古典经济学看作一个有力的思想武器”。我们认为这个看法也是值得商榷的。

诚然，反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斗争，是当前经济理论战线上的重要任务之一。但是，我们应当以什么作为有力的思想武器来对庸俗经济学展开斗争呢？在我们看来，首先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才是对庸俗经济学进行斗争的有力的思想武器。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经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进行过彻底的批判，而毛泽东思想更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新概括和新发展，是批判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思潮的最有力的思想武器。至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在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上确实与庸俗经济学的继续辩护的观点有所不同，但必须看到，古典经济学也是剥削阶级的学说，其中夹杂有不少的庸俗成分，某些庸俗经济学说正是在直接发展古典经济学中这种庸俗成分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在运用古典经济学中的某些因素作为批判庸俗经济学的思想资料时，必须是在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改造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发挥一定的作用。王亚南同志在文章中撇开所有这些，片面强调古典经济学是对庸俗经济学展开斗争的有力的思想武器，并且认为“这个道理，只要简略提一提一切庸俗经济学者都毫无例外地坚决反对古典经济学就够了”，则显然缺乏说服力，并且是不恰当地过高估价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作用。

王亚南同志在这篇文章中还提出：“今天，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了批判吸收人类文化的优秀遗产，为了理论建设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需要，有必要对这个资产阶级前进时期的古典经济学进行补课”。这里为什么提到“补课”，据文章进一步解释，是由于解放前中国社会从清末以来一直缺乏“接受、传播这个经济学说”所需要的“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而现在呢，为了“在学术上要展开百家争鸣活动，在教学上要加强基础知识、基本理论的训练，从经济学这门科学的角度上来说，显然也要加强对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我们认为这种看法带有一定的片面性，特别是忽视了古典经济学的阶级本质，不恰当地估计了古典经济学对于当前理论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意义。我们认为，在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由马克思、恩格斯早已创立，并由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同志作了巨大的发展，从而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发生了和正在发生着伟大的革命作用的今天，我们对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已不存在什么接受与传播的问题。至于作为人类文化遗产之一来对待，则必须首先看到古典经济学的阶级本质，并在这一前提之下进行批判的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当然会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上对于加强基础知识、基本理论的训练起一定的作用。如果撇开这一前提，而象王亚南同志在这篇文章中那样片面强调研究古典经济学对于“扩大思想境界”，“提高理论认识”和为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打下较深厚的基础”的作用，则同样是不恰当的。

从以上有关评价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几个问题的初步分析中，可以看出，只有进一步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学习毛泽东同志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自觉地以之作为研究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指导思想，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这一工作朝着真正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发展。